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远方诗意

Yuanfang Shiyi

刘庆邦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Beihang University Press

远方诗意

中国当代诗歌选

（第二卷）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远方诗意

Yuanfang Shiyi

刘庆邦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方诗意/刘庆邦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4.9
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系列)

ISBN 978-7-5396-4989-4

I. ①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7768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 丛书策划统筹:朱寒冬 岑 杰

特约组稿:上海之冠文化

责任编辑:岑 杰 周 康 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8.125 字数:160 千字

版次: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【作者介绍】

刘庆邦，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，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，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、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七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等三十余种，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。其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，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，其还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、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。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韩国等外国文字。



远方诗意

Yuanfang Shiyi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部 上北京 / 1

第二部 下江南 / 075

第三部 无望岁月 / 131

第四部 走姥娘家 / 191

第一部

上北京

我第一次上北京是在 1966 年冬天,那年我还不满 15 岁,正读初中三年级。我们学校的门楣上用水泥雕出几个大字:沈丘四中。沈丘是我们所在县的县名。我们的学校并不在县城,而是在离县城几十里的一个公社所在地。在上北京之前,我的腿很短,最远只到过我表哥家。我家离表哥家有十三四里。那是一个春节过后,表哥带我到他家去的,当时我还没有上学。母亲把事情搞得很隆重,我和表哥临行时,母亲在院子里放了三声炮,祝我这次远行一路顺利。表哥一会儿扯着我的手,一会儿把我背在背上,我们走过一块麦地又一块麦地,走过一个庄子又一个庄子,我觉得路程十分遥远。一路上我极少说话,前面的路一眼望不到头,我有些害怕。我脑子里还回响着母亲放响的炮,这炮把我身体内一些说不分明的东西点燃了,使我涌出一股股成长、远足和离别的情绪。当我回过头来,再也看不到我的村庄,那些情绪就进一步增强,变成了类似悲壮的情绪,还有那么一点伤感。就是那次表哥家之行,朦胧中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,让我知道了河那边还有河,天外边还有天。同时让我意识到我是有腿有脚的人,只要愿意迈开双脚,就可以到外面走一走,看一看,就可以看到在家里看不到的东西。也可以说,长大到外面去,成了我好好上学的重要动力。我上了初小上高小,上了高小考入初中,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事情明摆着,我只要能升到高中,就可以到县城去读书,因为全县唯一的一所高中就设在县城。

连县城还没去过,我从没有想过要上北京,是不敢想,也无从想起。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通广播,更不要说电视了。我听不见北京的声音,看不到北京是什么样子。我对北京的全部印象,是在小学课本上读到的在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,和印在课本上的天安门城楼。天安门的一个“天”字,只能让我往远处想,往高处想。

远,远在天边;高,高在天上,都不着边际。比方说我们那里的人都在地上,北京是在天上,地上的人想上天,做梦去吧!我的比较现实的愿望,是有朝一日能到县城看一看。我们村有一个人在县城高中教书,村里一些到县城拉煤的人,大都到他那里吃过饭,落过脚。他们回到村里,好长时间说的都是有关县城的话题。县城有电灯,有汽车,有戏园子。天黑了,县城的马路不黑,大白电灯把十字街口照得明堂朗路。要问县城的马路有多宽,恐怕并排走三辆太平车还有富余。让人稀罕的是,县城的马路不怕下雨,雨下得越大,路面越干净,越明亮,一点泥巴都不用踏。汽车有六个大轮子,看不见它的嘴在哪里,叫得却很响,在雨地里哇哇叫着就跑过去了。他们难免说到从戏园子里走出来的女人,每个人说到女人都笑着,大意为趣的样子,但他们说得都不具体,像是故意留下悬念似的。这些关于县城的传说我都记住了,并根据这些线索,初步想象出县城的图景。我的想象都是以电灯为起点,并让电灯贯穿始终。因为有了电灯的照耀,我想象中的县城的图景就是光明的、富丽堂皇的。对县城的向往,使我早早地就把目标确定了。随着暑假之后从初中二年级升入三年级,我觉得离到县城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

可以上北京的消息,对我们这些农村中学的学生来说,来得有些突然,我们每个人思想上都没有准备。这年过完暑假开学后,我们背着被子,带着粮食,按时从公社的四面八方赶到学校,按部就班地开始新学期的学习生活。暑期的劳动让我们厌倦,我们急于回到学校去。我们的中学是全公社的最高学堂,一跨进学校大门,一踏上杨柳掩映的青砖铺道,我们的胸脯不知不觉就挺起来了。这时我们还不知道,城市的学校学生们已经不上课了,他们纷纷打起造反的大旗,已把革命搞得相当热闹。我们不看报纸。也许校

长和教导处主任那里有一两份报纸,我们从没有看见过。我们想不起看报,也没资格看。对于我们这些中原腹地的农村中学生来说,一道道矮的和高的庄稼,构成了数不清的绿色屏障,那些城市的消息,还没来到我们学校,就被层层屏障阻断了,或者说被吃掉了。我们照样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,照样做很多作业,早上和晚上照样在煤油灯下上自习。我知道初中三年级的学习对我有多么重要,能不能考上高中,能不能继续求学,能不能走进县城,就看这一年了。三年级的语文老师,是一位学问很大的老教师。他给我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,是让我们写一写暑假的生活。这篇作文我绞尽脑汁,写得十分下力。在一年级和二年级,我的作文一直得到年级语文老师的好评,每年国庆期间班级出墙报,我的作文都要上墙。我想让我的作文继续在全班保持领先优势,我还想一上来就给新任语文教师留下一个好印象,以便得到老师的鼓励和栽培。让我意想不到的,语文老师在讲评作文时,不但没对我的作文说一句好评的话,还表情严肃地对我的作文提出了批评。老师虽没有点我的名,但我听得出来他所批评的那篇作文正是我写的。在作文中,我写到了阶级斗争。我说有一个地主家的女儿,嫁到了我们村一户贫下中农家里,贫下中农并没有因此对地主家的女儿放松警惕,而是密切注意地主家女儿的一言一行,随时准备和她进行斗争。果然,在地主家的女儿企图对生产队的某个水利设施进行破坏时,她的公爹,一位始终不忘阶级斗争的老贫农,及时制止了她,揭发了她。这作文的结论是,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,对混入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啊!这是当时写作的流行模式,我不知怎么就学会了这种模式。当时我为自己能写这样的作文而得意,觉得它突出了政治,起码是符合形势要求的。语文老师的批评对我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我脸色煞白,头蒙得

很大。我似乎觉得全班的同学都在看我，笑话我，包括那些女生。但我谁都不看，只看老师。我装作那篇作文不是我写的，老师的批评与我无关，我想用表面的镇静和专心听讲，排除同学们对我的怀疑。老师大概已经认识我了，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，我头上、身上都出了汗。老师说，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女是有区别的，不能混为一谈，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。老师还说，现在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，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。老师的学问确实大，他的话我似懂非懂。我想到了，老师一定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写了不少批评的话，等作文本发下来后，我得赶紧把作文本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一个同学看到。然而下课后，老师并没有马上走，把我招呼到讲台上的桌子前去了，还要单独指点我一下。老师这样做，等于向全班同学宣布，那篇糟糕的作文正是我写的，我的假装与我无关的努力算是白费了。我强忍着泪水站在老师面前，老师怎么指点，我就怎么点头。我无话可说。人的泪水是在眼里，但泪水的闸门往往在嘴里，我担心我一开口，会把泪水的闸门打开，泪水会流得一塌糊涂。最后，老师让我把这篇作文抛开，另外再写一篇作文，还是写暑假生活。我还是点点头。

上了八九年学，我对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都是尊敬的、顺从的，不敢对老师产生半点抵触情绪，流露出半点不满。可对这位新任的语文老师，我只能对他敬而远之。他一点也不给我留面子，影响了我在同学们中的威信，伤害了我的自尊心。我甚至想到，他可能与我以前的语文老师意见不合，因为以前的语文老师赞赏我的作文，他就故意压制我，和人家唱反调。那几天，我情绪低落得很，对作文完全失去了自信。跟我想到的一样，老师在我那篇作文上批得一片红。我很想扯巴扯巴，把那篇作文撕得粉碎，扔掉。我怕

老师再找碴儿批评我,就不敢撕。前面的作文在那里存在着,后面的作文我一个字都写不出。我对着作文本发呆,脑子里一句合适的话都找不到。就在这个时候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开始吹到我们学校来了,风是温和的,似乎还带有秋庄稼成熟的气息,说不上是风暴。那天下午,校长把我们学校全部三个班的学生集中到操场上,说要开展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要在各个班级发展红卫兵。红卫兵不要发展太多,第一批一个班只能发展三个,最多不超过五个,要挑品学兼优的同学发展。我们是第一次听说“红卫兵”这个词儿,这个词儿新鲜好记,我们没有念就记住了。校长对红卫兵的含义又做了解释,说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,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,所以称为毛主席的红卫兵。校长的说法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奋,我们理解,参加红卫兵也许跟加入共青团一样,要经过申请,考验,分期分批参加,能参加红卫兵的只能是少数同学。而且,哪个同学能参加,哪个同学不能参加,最终只能由班主任和校领导说了算,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学习学习再学习。说我们政治上不敏感也可以,说我们革命性不强也可以,反正我们学校的革命起来得很慢。我们看到班里的个别同学戴上了红卫兵袖章,心里羡慕得很。袖章是用红细布做成的,上面印着“红卫兵”三个金黄的字,加上我的同学一般穿的都是黑粗布衣服,袖章戴在衣袖上显得格外夺目,格外风光。羡慕归羡慕,校方没批准我们大多数同学戴袖章,我们只能看着个别同学风光。按我以往的学习成绩来讲,第一批发展的红卫兵应该有我一份。之所以没能首批加入红卫兵组织,我又想到了那篇作文,都是那篇作文捅的娄子,耽误了我当红卫兵。我就是这样,不管遇到了什么事,都习惯在学习上找原因。只要学习好,就一好百好。如果有一样学习不好,别的什么好事就可能落下。

我们班有五十多个同学,总有一些同学得风气较早,胆子比较大,也就是说造反精神强一些。这些同学的学习成绩相对来说较差,连中等都排不上,平时老是给学习好的同学当陪衬,过的是压抑的日子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到来,给这些同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机会,他们站出来了,说要造反,要革命。一开始他们的口气并不大,还有些脸红。嚷过几次之后,没听到什么反对的意见,他们的胆气就壮起来了,越嚷声音越大,脸色不再发红。班主任是我们的俄语老师,他到班里来上课时,那些同学就向他提出,他们也要加入红卫兵,也要保卫毛主席。若搁往常,班主任也许会断喝一声,把那些敢于调皮捣蛋的同学镇住。这次班主任笑着,采取的是放纵的态度,他说可以可以,你们去找校长吧,这事儿我说了不算。这位班主任还很年轻,我看见他的脸红得厉害。这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。那些同学要求当红卫兵,可以说是代表了我的愿望,我不好意思说,他们替我说出来了。同时,我又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可笑的,是不自量力,试想想,如果他们都能当红卫兵,红卫兵还有什么意思,我不愿与他们为伍。当他们去找校长时,我待在教室里没有去。我留意看了一下,和我同在教室里的,多是班里的干部和先期加入红卫兵的同学,还有全部女同学。班主任用流利的板书,为我们写下新一篇俄语课文的题目。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班主任,似乎在说,我们都是遵守纪律的学生,我们才是好学生。那一刻,我有了一种站队的感觉,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这种感觉只维持了一会儿,那些同学就回来了,他们是得胜回归,还没进教室就欢呼成一片。进了教室,他们更是群情振奋,欢呼雀跃,仿佛教室里已盛不下他们了。由于取得了胜利成果,他们之中的头头已经产生了,是一位姓张的同学。张同学取代班主任,站到了讲台上,他说,愿意革命的留下,不愿革命的滚他妈的蛋!我听出来,他的

话是针对我们这些刚才留在教室的同学们的，我们没跟他一块儿去找校长，他就让我们滚蛋。可全班的同学没一个滚蛋的，谁不愿意革命呢！我摸摸脸，脸上臊得发热，但我硬着头皮坐着不动。就这样，我也成了胜利成果的享受者。第二天，我们全班乃至全校同学统统成了红卫兵，全部戴上了鲜艳的红袖章。

我们正处在烧包的年龄，红袖章满足了我们烧包的欲望，它像火苗子一样，烧得我们到处乱窜。教室里待不住，我们就到校园里去。校园里还烧不够，我们就成群结队到集上去了。我们对红袖章的革命意义理解得并不多，只是觉得戴上新鲜、好看。这情景像过年穿上一件新衣服的孩子，愿意让更多的人看见。这天公社所在的镇子逢集，赶集的人不少。这时已是秋后，地里的庄稼收完了，人们带着收秋后的轻松心情，有闲心在集上走一走。当年的收成属于一般年景，不是太好也不坏。红薯长得挺大，高粱长得挺高，各家分的粮食，吃到来年春天问题不大。我们在集上一走，果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他们站下来向我们看着，识字的人指着我们的袖章，说“红卫兵、红卫兵”。这时我们心里美气得很，很想大笑。可我们都绷着脸，表情严肃得很，仿佛真的成了革命小将。来到公社门口，我们犹豫了一下。以前，我们对公社大门口的印象是森严的，别说进去，连探头往里看看都不敢。这次大家把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看了看，竟然走进去了。公社干部的表现助长了我们的气焰，他们一律笑着说，欢迎革命小将，欢迎毛主席的红卫兵。他们的谦恭对我们来说有点突然，我们还不太适应，应对不够有力，虽然我们把膀子端了又端，显得气焰并不低，可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返回学校，我们的革命行动才开始了。张同学勒令学校那位女图书管理员把图书馆打开，我们蜂拥而进，把书架子上的图书统统往下掀，往下扔。我们以破除旧文化的名义，要把有毒

的书来一次大清理,大焚烧。我们分不清哪是有毒的书,哪是无毒的书。不知谁说了一句,凡是外国的书都是有毒的书。那么,我们就把外国的书挑出来。我很快挑到了一摞,其中有两本记得比较清,一本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一本是《格兰特船长的女儿》。每位同学都挑了一摞后,我们没有在校园里烧。我们要把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公社,必须到集上去烧。这次烧书行动全校的同学都参加了,好像有的老师也加入了烧书的行列。我们抱着书,排着队向集上进发时,红卫兵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,革命的情绪已相当高涨。我们一路高呼口号,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,还有这个万岁,那个万岁,万岁万岁万万岁!我们对万岁这个词儿很熟悉,但越是熟悉的词儿越不进行深入究,反正觉得它是一个好词儿,跟着喊就是了。我仰脸往天上看了看,天很蓝,一群大雁正往南飞。我们的口号喊得震天响,好像对高空中的大雁没有任何影响,它们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和队形,该怎样飞还怎样飞。这时我的心情是愉悦的,还有那么一点骄傲,我想,当红卫兵真不错啊,革命很热闹啊!我们来到集上的十字街口,围成一个大场子,把厚厚的书册子撕开,撕烂,扔在一堆,放火点燃。那些陈年的书页都干,不含一点水分,比所有的木材都干,一见火就轰轰地着起来了。在阳光下,火头不是很大,不是很明亮,热度却是相当高的,我们的脸被烤得热辣辣的,不由得向后退着。有的灰烬被火头冲向了天空,黑蝴蝶一样在空中翻飞。有一个同学,用一根柳棍子向火堆中的精装图书戳着、挑着,使火堆中升起簇簇火花,看去像元宵节的焰火一般绚丽。在撕着书往火堆里扔时,我突然生了一点私心,想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揣进怀里藏起来。这本书我听人说起过,很想看一看。我往左右看了看,同学们没人注意我,大家都忙着撕书,往火里投书,我倘是把书迅速往衣服下面一盖,也许能躲过别人的眼睛。但我到底

没敢把书藏起来，在这人人争当革命派的关头，我的藏书行为万一被人发现，那就糟了，有可能被视为保护“大毒草”的人。书装订得很好，我咬着牙，硬是把书撕开了，扬手投进火里。我看见，火很快就将一本书读完了，火读到字面上，字面发出一层绿莹莹的光，这让我觉得十分奇怪。同学们这会儿没有再喊口号，也没有说话，面对大火一时有些静默。别看同学们都上了八九年学，这些书大都没有读过。也就是说大家读过的书没有这一会儿烧的书多。

不少赶集的农民也围过来看我们烧书，他们表情不一，基本的调子是惊奇。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可惜了，有人说这些书能烧好几顿锅。有一个农民，悄悄跟一个同学商量，能不能把撕开的书给他一点，他拿回去卷烟吸。那个同学拒绝了，说这些书有毒。一听说有毒，那个农民就被吓住了。

烧完了学校的书，我们的革命行动在继续扩大，分头回家搜罗自己家里可烧可砸的东西。回想起来，好像并没有人号召我们回家去折腾，我们一学习，一讨论，革命的自觉性就提高了，就联想到各家都有属于“四旧”范围的东西，也得拿来破一破。也许有一位同学先提到他家有一样旧东西，大家一起哄，分头的行动就开始了。我们没有到别人家去抄家，我们各自抄自己的家。我们脑子发涨，血已经沸腾起来，仿佛一夜之间，革命的重担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中学生肩上，如果我们不把革命的重担挑起来，我们全公社的革命就如一潭死水，就掀不起风浪，就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。我们当然是戴着红卫兵袖章回家去的。红袖章是革命的标志，是我们的尚方宝剑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武器，有红袖章在身，我们差不多有点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。我们家堂屋的后墙上，常年挂着一套四幅屏，也就是中堂字画。据说那是父亲花了不菲的代价从外面买回来的，已在我们家挂了相当长时间，在我尚未